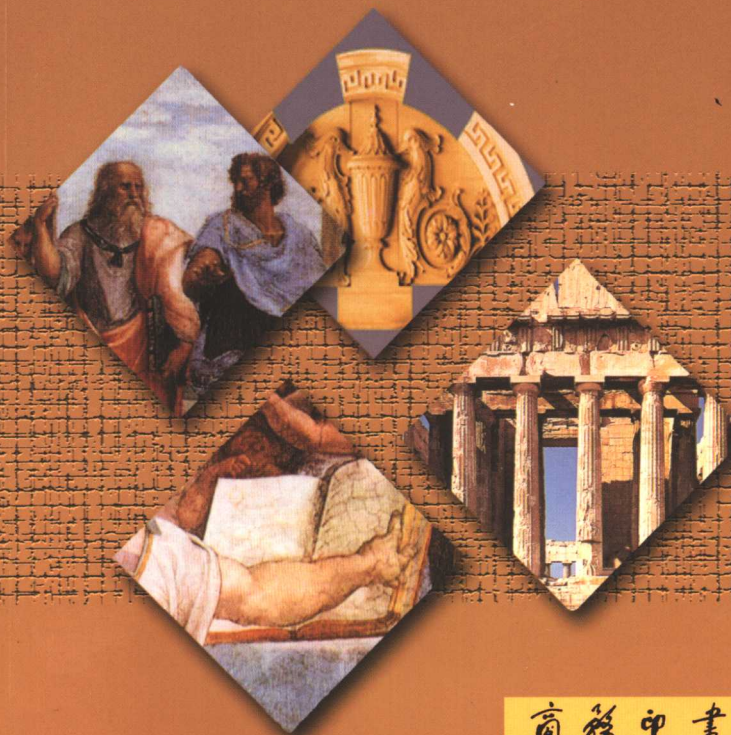


商务新知译丛

理性的探险

——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英〕H.P.里克曼/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新知译丛



理性的探险

——
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英〕H·P·里克曼 著 姚休 等译 岳长龄 校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的探险: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英)里克曼
著;姚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商务新知译丛)

ISBN 7-100-04962-8

I. 理… II. ①里…②姚… III. 社会哲学—研究
IV. C9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8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新知译丛

理 性 的 探 险

——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英] H. P. 里克曼 著

姚 休 等译 岳长龄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962-8/B·68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3/8

定价: 12.00 元

H. P. Rickman

THE ADVENTURE OF REASON

The Uses of Philosophy in Sociology

Greenwood Press,

London, 1983

据英国格林伍德出版社 1983 年版译出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Adventure of Reason*, by H. P. Rickm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 1983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前言	1
1 社会学与哲学	5
理性哲学	13
作为理性探险的社会学	17
2 柏拉图:理性的法则	25
角色、功能和理念	28
描述社会和人的理想类型	44
人性	52
3 笛卡尔:对确定性的寻求	63
笛卡尔主义及其社会研究方法	76
知识社会学的开端	82
4 斯宾诺莎:实在的理性秩序	93
上帝还是自然	97
人及其感情	108
三种知识	117
人的科学研究	122
5 康德:理性的批判	133

知识是心灵的创造·····	136
先验演绎·····	140
经验要素·····	143
作为道德之源的理性·····	149
科学哲学·····	157
6 结论:现代社会学的理性主题·····	173
理性的范围·····	173
人类的理性·····	179
方法论·····	183
理性哲学的贡献·····	190
认识论 and 知识社会学·····	199
 注释·····	 205
参考文献·····	217
译名对照·····	225
译后记·····	229

前言

本书的主旨在于将某些哲学观念介绍给社会学家和那些致力于社会生活研究的人们。它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对社会的研究——就像其他对知识的探求一样——包含着各种广泛的假设并使用通过参照哲学才能得到启迪的各种概念与方法。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必须严格限制试图从口头上使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念的做法，并且防止把许多参与连续不断的辩论的思想家蜕变成一些“名单”和“标签”。有鉴于此，我选择了某个单一的主题——即理性的作用。正如我们的整个理性传统与哲学本身一样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理性的作用与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社会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为了有效地开展这种研究，我只得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四位思想家之内，因为直到十九世纪初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四位思想家始终标志着理性主题的发展。

一旦哲学获得了开始与那门新学科(即社会学)进行对话的新功能,其研究方法也就发生了变化,需要单独对待。为此,我将专注于早期,那时形成了各种对于社会学的最终发展是至关紧要的概念(诸如因果性、功能、角色、目的)和范式,并发展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选取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这四位思想家,其理由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西方思想界中,他们是四位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对理性的传统,并进而对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社会学从中受益匪浅)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将柏拉图选作本书所论及的第一位哲学家,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是西方第一位自成体系的哲学家,或者至少说是第一位将其著作流传至今的哲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过哲学二千五百年的发展,他仍雄踞西方哲学界。同时,他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践,并对社会理论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对社会学所产生的影响犹如对我们整个文化的影响一样巨大。

假若将柏拉图描述为“西方哲学之父”的话,那么,笛卡尔则可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他致力于认识论的研究,并进而有预见性地指出和预示将改变我们整个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开创了人类思维的一个新时期。他对于社会学所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他对方法的批判性的反思。

斯宾诺莎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没有人能比他更简洁明快和更有说服力地阐述哲学的理性体系。他

不仅对理性所依凭的各种假设作了最清晰、最深刻的说明，而且详尽地论述并理智地提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所有人类的研究都将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就康德而言，他的思想在哲学史上是举足轻重的，其认识论达到了思辨成熟的高峰。这时，哲学已失去了它的“幼稚性”。自从康德完成了他的破坏性的分析之后，在西方的理性生活中，没有什么再能和从前一样了。他对道德哲学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深刻地指出理性自主的伦理含义。

尽管这四位思想家中的每一位都对社会生活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柏拉图尤其是社会学思想的一座“宝库”，但是，假如人们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社会学的研究方面，那么，这就贬低了他们对于社会学思想的杰出贡献。其实，他们对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完全是他们的哲学反思的产物，这种哲学反思在很长时期内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并为研究整个社会领域奠定了基础。因此，我试图系统地阐述他们的一些核心观点，并且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他们的思想，我想集中通过他们的一二本重要的和容易得到的著作来加以说明。对于柏拉图，我将通过《理想国》来阐述他的思想；对于笛卡尔，我将通过《方法谈》和《形而上学沉思》来阐述；对于斯宾诺莎，我将通过他的《伦理学》来阐述；而对于康德，我则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

学的基础》来阐述。当然,这样做并不排斥参照他们的其他著作,也不排除参照其他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解释了哲学应用于社会学的方式。第二至五章依次论述了四位哲学家的思想,首先简要地介绍他们的生平、个性及其著作,接着阐述他们的主要思想,并讨论他们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则说明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与当代社会学的主要论题之间的关系。附在最后的文献目录包括本书中所引证过的书目、专用术语一览表以及进一步阅读哲学著作的推荐书目。

本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写作的：即认为研究社会的学者也许能从那些将理性作为自己研究主题的哲学家的思想中受到教益。因为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系统研究都必然会受到理性的指导，因而主题的选择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论证，但坚持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把握则需要论证。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致力于扎实地探求真实知识和实践认识的人们，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哲学活动（诸如思考基本观念、分析概念、考察基本假设以及勾画理性框架）上？是什么动力驱使致力于人类生活情景研究的人们去追寻抽象的观念？

5 —

为了表明那种理性的哲学（除了它饶有趣味和引人入胜外）可直接用来研究社会，人们需要证明：首先，所有的系统研究都依赖于某种具有非常普遍的前提的理论框架；其次，就社会学而言，这种框架不能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

认识事物并非就是一个让现实自己印到我们心上的问题。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只有在它们适合于有关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课题本质的整个观念情境和前提时,才能成为知识。例如,假若我们自身不具有某种推理的能力和某些秩序的原则(诸如因果性),我们也就不能说明任何知识。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包含着人类和社会的各种补充性假设。人是有目的的、有理性能力的,并且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这并非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实,而是我们加之于这些事实的假设。其他的假设则涉及到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或者人性的可塑性程度。

我们从上述这些问题中所作出的各种假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着个人行为、教育以及政治倾向;与我们的目的最贴切的一点是,它们决定着我们怎样进行研究。由于这些假设的重要性,因而需要对它们进行澄清、进行批判地考察,有时还需要进行修改。这是一件与社会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截然不同的工作,但它却是哲学家所通常全力以赴的工作。这些基本假设远非是一种为了假设而假设的“游戏”,也不是一种只有当科学还不能用坚实的知识去替代各种猜测和期望时才有意义的“游戏”,而是说它本身就具有一种严格而永久的功能。通过考察或者甚至提出关于世界的普遍的假设,哲学家建构了关于我们想研究的问题的综合图景,并阐述了什么可以认作知识的标准。这两条

在对知识的实际追求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这种指导，我们将不能区分化学与炼金术，也不能区分社会学与老太太讲述的故事。我们总是过分地怀疑，以致于不能开展研究，正如更常有的是，我们总是过分的轻信，以至于难以达到客观的结果。而且历史已证明，有知识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信在他们的参照系被一种新的哲学认识论（即笛卡尔的认识论）¹所粉碎之前，他们是无法摆脱“邪恶”和“妖魔”困扰的。所有我们作为真理和科学而予以接受、作为偏见或迷信而加以谴责、作为常识（common sense）而予以赞扬或者作为狂妄而加以诋毁的一切东西，都依赖于我们所予以接受的哲学理论框架。

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研究社会领域的学者，实际上却为发展和保证他们的理论前提而去研究哲学论证？为什么一旦这样做，他们就不能没有顾忌地喜爱他们的研究结果？归根到底，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中，我们没有觉得有必要去不断回顾有关我们思维的基本前提。例如，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科学史也许是引人入胜和令人振奋的，但对于他的工作却并非是必要的。

有四种明显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学需要回溯至“初始原理”的原因。社会学必须证明它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它必须满足或阻碍它所能达到的某些很高的期望；它也必定会面临它自身的研究课题所固有的客观性问题；因此，社会学在方法上始终众说纷纭。

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的推广与普及主要是对不断增长的现代生活的复杂性的一种回应。生活在现代群体社会中的人们（并非在小规模的，而是在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中），并不像认识邻居或朋友那样认识政治领导人、官员、商人以及他们所必定遇到的其他人，而且他们也不是根据自身经验而学会怎样与这些人打交道的。因为作为政府、政党，以及工会的成员，或者作为超级市场、国营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的雇员而起作用的人们，只有根据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影响其成员行为的方式才能得到理解。甚至若要理解处在私人关系中的人，我们也可能需要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社会背景。因此，现实的需要产生了用来研究这些社会背景的社会学原理，并提出了有关雇主与雇员、父母与子女以及夫妻之间的行为指导。

由于承担了这样一些职责，社会学也就变得有争议了。有些人渴望能在城镇规划、劳资关系以及教育方面求得社会学的帮助；而另一些人则怨恨社会学在这方面的干涉。凡是在社会学揭示出社会制度的运作状况的地方，它就被指责为是一种起破坏作用的批判理论；凡是在社会学指导人们怎样协调社会组织的功能的地方，它就被怀疑是现存秩序的“奴仆”。由于社会学家被迫从道义上去研究各种敏感问题，因此他们陷入了社会和政治的争论之中。

由社会学所引起的期望超出了它分析社会关系的

作用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建议与方法的范围。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和建立在哲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怀疑论的不断兴起,使得人们转向对我们的文化中最令人尊敬的部分,即科学的理解和指导。显然,在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方面,社会学通过依靠经验事实和细致的推理而非依靠信仰和思辨,显示了我们时代的科学特征。人们感到,研究人类世界的学者必须对人类的尊严、社会秩序的谬误和愚蠢,以及人类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加以研究。这种指导和预见的任务或多或少地落在愿意承担者的肩上。

由社会学所起的作用而提出的客观性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期待,有其深刻的根源。不管怎样,我们已从本质上内在地认识了社会生活,因为我们不仅自出生以来就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而且我们通过自己的感情与态度制造这些关系。这种个人的利害关系给了我们特有的洞见,不过它经常给社会学造成危害和麻烦。通过考察与我们自己相似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确认那些可能影响我们的反应,我们有可能变得不是过分的宽容就是过分的严厉。随着从批判的研究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事物中退却,我们可能欣慰地转向更少轻率地去研究事物的本质。这也许是自然科学似乎要比人文科学发展更快的原因之一。

我所列举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有助于使第四个问题,即社会学家在其主题的本质、目的以及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所不断出现的冲突永久化。事实上,并

不存在单一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彼此一致的研究范式。

这些不同的问题迫使社会学家去重新审视各种基本论题。只要他进入政治领域,就必须表明他的方法使他免受了天生偏见的影响。只要他被要求对道德和社会问题作出判断,就既不能心不在焉地忽视也不能自鸣得意地接受这种角色,而必须根据某种关于他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批判性评价,来证明不管他所采取的哪种社会学观点都是合理的。个人偏见的危害也迫使他逐渐具有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社会学内部的连续不断的争论,为某种关于社会学所依赖的前提的批判性考察提供了同样的教训和需要。

因此,这些被人们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哲学的传统主题。社会学家关注的东西也正是哲学家的研究主题,这一表面的悖谬揭示了理智生活的统一基础,而这种基础则被对于由知识的增长所促进的越来越专业化的需要所掩盖着。在本书中,我已从一系列互相依赖的“网络”中,挑选出社会学家可以使用哲学来使用的一些方面,正如人们乐意挑选出这样一些话题一样:即社会环境的知识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怎样为哲学家的工作提供启发。

强调我们理智传统的统一基础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谈论个别的社会学家所要求——和可能接受的——他们的哲学同仁的帮助。这种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也许是有用的,但迄今却仍罕见。也许还缺乏

足够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哲学家对于这一领域的兴趣只是在近来才得到复苏，并开始要求一种只是近来才被极少数哲学家所拥有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足够的知识。

因此，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大家可以享有并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享有的传统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经常被另一个研究领域所吸收。尽管社会学作为一门有着自己方法论体系的独立学科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它（正像其他认知科学事业一样）继承了某种共同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理智传统。社会生活是理智传统中的一个持续稳定的部分，历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哲学家，都从事于记载社会行为的研究，并远在社会学独立存在之前就开始对社会行为进行理论研究。这种理智传统也构造了基本的概念、假设和作为所有训练有素的探究的基础的观点。因此，哲学早在二千六百年前，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起着卓绝的作用。

通过把哲学史的最重要部分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相联系，我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经历了理智的探险并且从关于我们共同的祖先和共有的问题的意识中吸取力量。假若个别学说，如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任何学说，都满足于在它们自身的领域里所起的作用，那么就等于宣判它们自身是无效的。

我这里所说的理智探险是指对于知识的追求，是